

本书以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为主，着力揭示了辛亥以后至今的各代知识分子及每一代知识分子内部各小群体与五四启蒙的关系。由于作者能把大陆、港台、海外的有关资料熔炼于一炉，并对中西启蒙、中日启蒙、五四与五四以后的启蒙进行比较研究，因而能够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五四与

现代中国

丛书



中国的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 著者〔美〕微拉·施瓦支

中国的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著者 / [美] 薇拉·施瓦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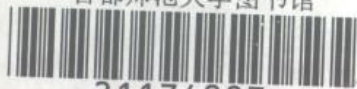
译者 / 李国英 陈 琼

李声笑 许剑波

校者 / 吴景平

山西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4087

1174087



中国的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美] 维拉·施瓦友 著

李国英 等译 吴景平 校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6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2册

*

ISBN 7-203-00858-4

K·35 定价: 4.85元

总 序

发生于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神经。七十年岁月流逝，五四早已时过境迁，但五四所揭示的历史主题——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心求索的时代主题。时下现代化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反思，骤然缩短了五四与现代中国的时距，而使五四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渐凸显出来。在历史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传统仍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民主和科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启蒙主

2076/16

题。这一切不无悲剧意味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仍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五四孕育了文化巨变的时代，但由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严峻和变革主体思想的局限，终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嬗变。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文化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还须从重新认识五四开始。这种重新认识，既是对五四启蒙事业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时代局限的超越。只有在继承和超越五四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实现重建和复兴。因而，在伟大的启蒙时代逝去大半个世纪而中国步入变革与复兴历史关头的今天，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

有感于斯，值此“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编就了这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丛书的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凭吊历史，而果其名所示，在于以现代中国的宏阔历史视野重新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省察五四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寻觅中国文化转形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途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对繁荣五四和近现代中

国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而且能对广大关心民族命运和文化前途的读者有所裨益。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1989年1月于北京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学者维拉·施瓦支（美国威斯理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潜心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是近年来欧美学者有关“五四”研究专著中影响较大的一本。本书作者撷采大量史料，并尽可能访问了幸存的五四运动亲历者；作者叙述的时间跨度大（从辛亥前夕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对各个时期的启蒙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比较研究，也将中国的启蒙与西欧、日本的启蒙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样，本书的作者便能提出不少颇具识力的观点。因此，本书对有关的研究、教学人员，以及广大的读者，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当然，作者的某些看法和我国读者之间肯定会有歧见。我们认为，比较全面地了解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及其他观点，无疑会有益于我国社

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本书各章译者：第一、二章 李声笑；

第三章 陈 琼；

第四章及前言、结论 许剑波；

第五、六章 李国英

全书由吴景平统校。

目 录

导言：启蒙在现代中国的特殊性…（ 1 ）

启蒙与现代化的要求（5）——作为启蒙代表的知识分子
（11）——注释（14）

第一章 1919年5月4日：新一

代的形成……………（ 17 ）

几个五四青年(21)——改良者、怀疑者与建设者；五四时代背景(29)——中国启蒙运动的日本来源(36)——革命的失败和启蒙的序幕(41)——1916年前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觉醒的种子(47)——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1917—1919年(54)——注释(61)

第二章 新型知识分子的出

现：代际合作与歧见 …… (67)

先生们的醒悟及对新青年的寻求(69)——觉悟的新青年，传统的受益者(75)——新潮社的创立，共同觉醒(81)——“夜猫”和蛇：关于“新潮”的代际争论(86)——知识分子和语言文字：历史的契约(91)——文学革命：代际合作的产物(96)——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03)——注释(109)

第三章 五四启蒙运动 …… (114)

探寻科学的世界观(117)——对家庭伦理观的反抗(127)——转向西方和对国民性的批判(137)——从思想批评到反传统(142)——从思想转变到社会革命(148)——知识分子在五卅时期的困境(158)——注释(165)

第四章 政治暴力的严峻

考验：1925—1927 …… (170)

暴力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75)——血的洗礼：1925—1926年(180)——教师们对学生遇难的反应(184)——反帝与启蒙并举(191)——实际行动与启蒙思想(201)——恐怖与理性的失败(210)——“打倒知识阶级”(221)——充满怀疑的现实主义者(229)——注释(233)

第五章 走向新的启蒙

1928—1938年 …… (241)

二十年代后期群体意识的复兴(244)——从绝望到重建信心(249)——大众语运动(256)——反革命文化：蒋介石和日本人(265)——1936至1937年的新启蒙运动(275)——

战争及其对中国化的压力 (284) —— 历史造成的迷惑 (292)
—— 注释 (296)

第六章 五四的启示 (304)

官方对五四的看法 (309) —— 忠诚的检验：五四纪念的
关键时刻 (317) —— 服务于传统的回忆 (329) —— 回忆与知
识分子的自主 (338) —— 1957年：五四精神的相传 (346)
—— 注释 (352)

结论：启蒙的持久挑战 (360)

启蒙与救国 (364) —— 启蒙与知识分子 (369) —— 后政
治启蒙 (376) —— 注释 (380)

导 言

启蒙在现代中国的特殊性

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如果没有其它人的引导，这种蒙昧的人就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理解力。倘若这种蒙昧不是由于缺乏理解力，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即缺乏在没有别人引导下敢于理解的勇气造成的，那么这种蒙昧就应归咎自己。Sapere aude！勇敢地认识吧！坚信自己的理解！这便是启蒙的真谛。

——康德：《什么是启蒙》^①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中国人对此的回答具有近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特征。这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这是一个以乡村为基地的革命的展开时代，这又是一个从封建世界观中寻求解放的时代。人们长期以来便认识到，正是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变革过程，使得中国成为第三世界学习的典范。而社会理论家们则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与社会变

革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紧张关系。②最明显的，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杰出文人的生活和工作，就不难发现在民族主义和文化批判之间存在的矛盾。用中国话来说，是反帝以救国呢，还是反封建以启蒙呢？那些在国内外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此二难之间的抉择尤为艰难。和亿万同胞一样，他们希望着中国的独立和强盛，并为此积极参加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

然而，他们不同于纯粹的爱国革命家，他们拒绝把中国的落后——即自己造成的愚昧——归咎于外来侵略。即使当欧美、日本等帝国主义入侵加剧、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也决不为中国的旧传统歌功颂德。相反，他们一再提醒人们警惕传统的重负，号召人们根除对宗法势力，即对家族和官僚国家的盲从忠顺。即使在今天，中国领袖和民众仍视思想启蒙为生死攸关的艰巨任务。

十八世纪的欧洲：“什么是启蒙？”实际上是重复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是真理？”③在整整一代哲学家中，康德对此作了代表性的解答：启蒙是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实现自我解放。这是欧洲几百年以来坚持不懈的理性探索的结晶。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并没有欧洲那种理性探索的传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康德的问题。比起欧洲的启蒙先驱，他们要浅显得多。他们只能期望着一种急切的、甚至不完全的从自我奴役中实现的解放。

国势衰微，民族危亡，这是中国启蒙学者所处的不同于

欧洲启蒙先驱的历史条件。1919年春，北京大学的一批年青学生成立“新潮社”，发表宣言，试图以康德的界说为训，倡导启蒙，挽救时局。十八世纪欧洲的哲学家们认为，“敢于认识”是他们固有的权利，而“新潮社”则只能恳请当局准许他们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新潮社”的宣言听起来只不过是前科尼斯堡那位哲人缜密沉思的微弱而苍白的回声：

“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不忍弃而弗论也。”^④

尽管这种“回声”并不悦耳，但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学者毕竟对欧洲启蒙学者的思想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宣传。知识分子以启蒙思想为武器，抛弃了精神奴役、盲从和“与世推移”等劣根性，或者至少揭露了其弊害。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知识分子则为之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族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启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⑤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神迷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这是一种长期的、今天仍在进行的背叛。

欧洲的启蒙时代，“自己造成的蒙昧”来源于基督教教义，腐败专制的教会势力也推波助澜。相反，近代中国的精神麻木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的孔教，或更准确地说，是“礼教”。^⑥礼教思想通过科举考试得到加强，使人们养成了对官僚化的封建帝国的忠顺心理。同样，人们在家庭中也恪守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这些纲常都宣称是建立在互助自愿基础上的，但除了最后的“朋友”之外，其余各纲常都排斥了自主和平等。这便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中自我解放的目标。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学者们发动了一场伏尔泰称之为针对“宗教狂热”^⑦的进攻，中国的激进分子同样猛烈地攻击了中国社会的惰性和精神麻木。与欧洲学者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战胜迷信的迅速胜利并不感到满足。既然他们并不是为了打倒那个超自然的上帝，而是为了根除人们对宗法势力（皇帝、父亲、党魁）的盲从，那么他们就必须准备与同胞们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狂热冲动，作持久的斗争。

“破坏”和“危险的”，这是西欧和中国的启蒙先驱受到的共同责难。此外，中国的启蒙者还有另外一个罪名：“非中国化”。在民族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启蒙先驱若想坚持对本国文化的批判，他们所碰到的困难要比欧洲的先行者

们大得多。欧洲启蒙学者并不担心什么“非法国化”、“非英国化”或是“非德国化”之类的指责。那时，大家都是彼此信赖，全欧洲的反传统主义者都是亲如一家的，没有什么政治的或民族的界线。然而，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传统发展到二十世纪，使得“国家”成为人们极其关注的问题。作为内战连绵、外患不断的中国公民，作为启蒙的鼓吹者，他们常常受到攻击。即使在今天，当他们试图发现并应用理性批判的时候，他们也必须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

启蒙与现代化的要求

正如150年前的欧洲那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批判理性的发现预示着一种转变，一种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然而，不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这种转变既不鲜明，也不象启蒙者想象的那样完美。^⑩基督教和孔教的思想体系瓦解了，但余毒还没能肃清，还藏在自以为现代化了的男男女女的内心深处。当他们试图用客观怀疑来代替迷信和偏见的时候，它就会从中起破坏作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统文化对启蒙的破坏具有反复出现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不止一次地目睹和亲历了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因而他们比欧洲的先哲们更有理由惧怕旧思维习惯的复活。

为了使中国能够走上真正现代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殚精竭虑，做了不懈的努力。从一开始他们就很清楚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消化和适应性，所以他们需要站在另一个新的角

度来批判中国国民心理的劣根性，对同代人视作天经地义的信念和价值观，提出大胆的疑问。于是，他们求助于西方（更准确地说，他们大多是从日本人那儿读到有关西方书籍的）。中国的激进分子愈是提倡文化相对主义，人们便愈加猛烈地指责他们企图把西方的现代化思想输入并改造独特的中国文明。知识分子们所以敢于冒险犯难、不避众怒，就是因为中国历史本身早已证明、而且至今仍然不断证实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一个自称现代化了的、甚至革命化了的社会里，封建主义仍然严重地噬啮着其心灵。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首先注意到如何建成现代国家的问题，后来才注意到启蒙。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帝国的官员们就在探索国家强盛、抵御外来侵略的道路。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张之洞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应该发起一场爱国革命，谋得中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他的主张，不过这种“体用”说实行起来是颇为困难的。政治改革者们发现，“体用”是统一的。西方的“用”，是建立在西方“体”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用”是与中国封建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与儒学，根本对立的。^⑨这种体用分离说导致了一种倒退和文化保守。同时它又为少数最早觉悟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机会，使得他们能够从国外学来批判理性，以此为武器，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复兴民族，重振国家。

本世纪初，第一代怀疑张之洞“体用说”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大多留学日本或欧洲，虽然也受过儒家思想的教